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洵研究*

赵中亚**

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帝国的惨败,导致中日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清廷从中央到地方,派出不少人员到日本考察,同期也有不少自费到日游历,以期通过效法日本,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当时留下的记录,多以“东游日记”为名,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掌握的情况,甲午以来中国人东游日记总计达270种(内含民国时期的77种)^①。这些日记差别很大,有些浮光掠影,议论肤浅,资料拼凑;有些则敢于接受新事物、新气象,并形成自己的认识。不管怎样,作为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以及近代中国谋求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模式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生动记录,很值得研究^②。

当前关于清末东游日记的研究,多关注的是官方背景较为浓厚的张謇、严修、吴汝纶、陈荣昌、盛宣怀等人。江苏常州人程洵,1904、1906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③,一次是自费考察大阪博览会以及日本全国学务,一次则是奉山西巡抚恩寿之命考察教育以及医学,后者留下《丙午日本游记》一册。然而,在相关研

* 本文得到2018年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术基金项目(ZYG001812)支持。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

①王宝平《丛书序》,《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熊达云《清末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甲府、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98年版;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转引自王宝平《丛书序》。

③《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靳云鹏呈特保前交通部参事程洵拟请以道尹交政事堂存记任用并批令》,《政府公报》1914年第787期。

究中,甚少提及程澹及《丙午日本游记》^①。少数研究提到了程澹,但对其在山西的活动以及东游的情况鲜有论及。以杨雨青的研究为例,虽然她曾接触到了清末的47种东游日记,程澹的《丙午日本游记》亦在其列,但其研究中仅引述了程氏游记序言中的一句话,意在说明大部分东游考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未产生重大影响^②;而在李玉的研究中,程澹被视为“纷纷赴日参观访问,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寻求中国富强之道”的众多清末学者爱国人士中的一员,其作品与王韬、李筱圃、罗振玉、张謇等的一样,“造诣较高,影响较大”,但对程澹生平及游记内容只字未提^③。此外,在一些研究中,程澹的《丙午日本游记》甚至仅作为李叔同在日本学习绘画的资料来源而存在^④。至于程澹本人,通常是作为印人、书画家偶被提及,间或提及其曾作为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的重要角色,谈及所刊刻的《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并无端被目为康有为弟子,如张颂之称程澹,“是康有为的弟子,他是宗圣会的会员,在30年代成为鼓吹尊孔读经的一个重要角色,并出版《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一书,得到了当时众多要员的支持”^⑤;景迪云亦称程澹“是康有为弟子,尊孔崇儒,编辑过《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孔子年谱》等。文脉所系,自然以本地为自豪,钤印‘阳湖程澹’,既表籍贯,又

①如彭雷霆的《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清末东游日记并非其研究主体材料。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教育观》(《日本研究》1999年第1期),参考了20种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日本考察日记;孙氏还著有《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参考东游日记30余种,皆未提及程澹及其考察活动。自1990年代以来,影印或者整理的清末东游日记已然不少,如刘雨珍、孙雪梅主编的《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日本军事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影印清末东游日记数十种,程澹之《丙午日本游记》皆不在其列。直到叔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丙午日本游记》始收入其中。

②杨雨青《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第124页。

③李玉《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2页。

④林子青《弘一大师传》,收入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周成《西方人体艺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收入陈醉主编《人体美与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7页;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

⑤张颂之《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齐鲁学刊》2008年第5期,第34页。

明文宗”^①。实际上 程涓并非康有为弟子 其自身在清末时期的活动 尤其是他的日本考察 颇值得研究。

一、早年时期的程涓

1. 程涓与康有为

程涓 江苏阳湖人(今常州市),早年事迹不详。1897—1898年间帮助李提摩太处理广学会及其他事务。1898年,李提摩太被康有为等人推荐给光绪皇帝作顾问,程涓随同到过北京,而与康氏发生了间接的关系,事见程氏为其个人所藏康有为给李提摩太的书信所作的跋文:“光绪丁戊间(1897—1898)余佐英人李提摩太君办上海广学会……时景皇帝(光绪)欲特开懋勤殿,拜李君为顾问大臣。七月二十四日,李君与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属,适英使避暑外出,翌晨乃迁至米市施医院。八月三日午后康先生来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请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调和两宫乎?’康曰‘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罢黜,哭诉太后,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仓皇出逃,梁启超等人也手足无措。经容闳提醒“政府缇骑四出,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提摩太始认识到康梁等人处境危险,但他认为梁启超仍能自救“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之画策也。”但对于是否营救康有为,李尚犹豫。在此情况下,程涓对李提摩太的决定产生影响:“李提摩太)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西人之睹国者,皆言贵邦政治已入正轨,循序以进,不难富且强,不图有此挫折!’余曰‘全国风气不开,诸顽固党群附太后,欲革新政治,岂易易者?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

^①景迪云《康门弟子程涓:诗人·印人·茶人》,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马衡研究专辑)总第29辑,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②《程涓跋(李提摩太致康有为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421页。

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邦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之。’李不语,久之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耳已。’……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伦敦政府,英首相沙士勃雷侯复电允许,乃派工部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轮船,乘风破浪,直抵香港,是为康先生出险之始。”^①

康有为脱险后,给李提摩太写过四封信,其中包括拜托李氏打听光绪皇帝的安危以及其他维新人士的消息,请李氏协助其门人为康广仁等人收尸等^②。这些书信,李提摩太后来全部交给程涓收藏^③。1924年,程涓在上海将信交给了康有为,令康氏很是感动。在《癸亥跋后》一文中,康有为详述了其戊戌变法失败后给李提摩太所写的几封信失而复得的情形“程君白葭乃能藏吾旧书,出以相示,重提往事,惻惻寸心……白葭高义,始终如一,又保全吾戊戌影像,即捕索之像也,亦可悲感矣。”^④而《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中,康有为长女康同璧再次提到这段往事,并点出程氏在李氏搭救康有为过程中的作用:“(1924年)正月……程伯葭来沪,出示戊戌出亡时致英人李提摩太书……程伯葭君时为李君随从秘书,得梁启超八月初六日告变之信,知先君将不免,程君急劝李提摩太电问上海英总领事白利南求救,而先君始于英舰保护之下,安全到港,皆程君发动之力也。”^⑤

所以,程涓与康有为并不存在师生关系,他之所以出力帮助康有为,或因其身上所具有的侠义之气。程涓曾为在哈尔滨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人安重根作传,并组织王树枏、易顺鼎、贾恩绂、蔡元培、王照等人为《安重根传》题词。其中有位名为狄郁的人称程氏,“谓当移锋毙内奸,词挟风霜义尤足。百世

①《程涓跋〈李提摩太致康有为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21—422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13—416页。

③《程涓跋〈李提摩太致康有为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第420—422页。

④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版,第198页。

⑤蒋桂林编,康同璧(文佩)著《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22),宏业书局1987年版,第162页。

奋兴来軫道，英雄感力良堪卜”；王树枏也称程澐，“喜任侠”^①。

事实上，在康梁被通缉的年代，作为朝廷官员的程澐，在日本考察时，也未回避与康有为相关的人与事。如1906年10月15日（公历11月30日），程澐参观横滨大同学校时就注意到，“有康有为书联云：夏声涵海来重译，孔学递邮演大同。又有新会梁启超书联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第问耕耘”。他还了解到康广仁夫人在该校任教员^②。10月18日（公历12月3日），到神户时，程澐还专程去见康有为弟子、当地同文学校校长汤刚（字觉顿），两人乃旧相识^③。

2. 程澐与山西《晋报》

《晋报》是山西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山西的铅字印刷技术最早在该报中出现，比《并州官报》《晋阳日报》都要早。而《晋报》的创办人及主持者正是程澐。

程澐怎样到的山西，又是如何成为《晋报》的创办人？新闻史家姚福申引用了清末山西留日学生杂志《晋乘》上的说法：“与清朝官员沈仲礼有些裙带关系到的山西。1900年，沈氏奉命到山西主持洋务事宜，程澐随同前往，附名于洋务局。1901年李提摩太重回山西，以地方的庚子赔款，设立山西大学堂。在李提摩太和沈仲礼的提携下，创办了《晋报》，并任主笔之职。”^④程澐与沈敦和是否存在裙带关系，暂时查无明证，不过沈、李二人对程澐的提携应当属实。

至于《晋报》的历史价值，姚福申的评价很低，他认为《晋报》“是当时全国印刷最差，价格最贵的一种报纸……该报是民办的官报，销数不足五百份，绝大部分系抚宪札饬各衙门订阅，另一部分则由州县强派于民间……新闻大都采自京沪各报，时效性很差。整个报馆并无专人担任访员，消息的闭塞可想而知”^⑤。但事实上，《晋报》并非像姚氏所言的那样不堪。

首先，转载他报新闻、论述的做法，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中很常见，《晋报》上

①引自王元周《安重根与中国》，《知识交流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8年，第11—13页。

②程澐《丙午日本游记》1907年印本，第93页上、下。

③程澐《丙午日本游记》1907年印本，第96页上。

④《程澐之丑史》，《晋乘》1907年第1期；另见姚福申《程澐与晋报》，《新闻战士》1985年第2期，第47—48页。

⑤姚福申《程澐与晋报》，《新闻战士》1985年第2期，第47—48页。

的文章也被其他报刊转载过。例如,1904—1908年间,《东方杂志》曾大量转载其他报刊上的文章,其中采择最多的是《中外日报》,《晋报》也至少有2篇文章被《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第10期)转载,即《论政府宜宣传利用报馆推广白话演说》与《立宪私议》^①。其他报刊也转过《晋报》的文章,如山东巡抚周馥创办的《济南日报》^②。此外,《振华五日报》第25期(1907年8月13日)转载过《晋报》中的《论工艺局亟宜筹办》^③。

其次,《晋报》的编辑及主持者具备办好报纸所需要的业务素质以及人脉关系。《晋报》创办之初编辑为谢荫昌(1877—1930,字演苍),程涓同乡,具备出版相关经验。1899年,谢荫昌在常州致用精舍讲学,后与蒋维乔等创设修学社,翻译实用书籍,为上海书局编辑《最新经世文编》。谢荫昌曾给《时务报》投稿而被汪康年邀到上海,并被推荐为《选报》的编辑^④。至于程涓本人,协助李提摩太办理广学会并参与戊戌维新的经历,不仅令其积累到一定的新闻出版经验,并使其在当时新闻界获得一定的人脉。程涓与在北京创立《启蒙画报》《中华报》《京华日报》的著名报人彭翼仲是很好的朋友。《启蒙画报》曾以赞赏的口吻介绍程涓所创立的晋明小学校学生开风气之先,“因为省城地方大,演说的人少,就商量起来,每天工课完后,跟着在街上演说报纸……说的又透彻又清楚,所以听的人越聚越多……不料几个十几岁的小学生,居然有这开风气的大志愿,真是可爱”^⑤。彭翼仲后因报道袁世凯诛杀康党被捕,并被发配新疆。在被遣戍途中,彭氏路经山西,受到程涓的招待,“《晋报》主人程伯嘉遣仆在此久候,并带来信一封,银六十两”。第二天,程涓还到榆次县王胡镇与彭氏见面,并建议彭氏请日本人帮忙^⑥。

最后,程涓主持下的《晋报》,向地方摊派的做法,并不尽如姚氏所言全为负

①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1—392页。

②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③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卷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5页。

④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人物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98页。

⑤《小学生热心演说》,侯杰、王昆江编著《醒俗画报精选》,第225页,转引自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611页。

⑥彭翼仲《戍程载笔》卷一,姜纬堂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242页。

面影响。例如,袁世凯就曾效法《晋报》的做法,指示下属大量购阅《北洋官报》,“并照山西《晋报》向章,以代销报数之多寡,核定功过。故所属多来购买,以便转派分销,因之该报销路日见其畅”^①。由此可知,政府官方对报纸以及书刊的推介,在报刊草创时期很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确实有人通过《晋报》了解山西乃至全国的情况,如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就留下了许多阅读《晋报》的记录。

1902年9月18日,刘大鹏首次见到其东家(太谷县大户)送来的《晋报》,“近日省城设晋报局,仿照上海天津《申报》之法”。当日,刘大鹏从中获悉中国各地正在暴发瘟疫。11月18日,刘氏从中获悉各地教案的情况;12月9日,得知清政府在实施新政;12月12日,获悉北洋在试行印花税。此后,直到《晋报》停刊,每年刘大鹏都有不少阅读该报的记录。

1903年11月9日,刘大鹏得知俄国人占领黑龙江;12月8日,又听说东三省全部为俄人占领;12月24日,听到正太路已经开工兴建的消息,刘大鹏却以为“矿务大兴,晋人不能安枕。”

1904年4月20日,刘大鹏获悉清廷要裁撤各省州县的教谕职位,慨叹儒生将无出路;10月2日,刘大鹏再次认定正太铁路将导致山西门户大开。

1905年、1906年,刘大鹏也有阅读《晋报》的记录。1907年,从《晋报》上,刘大鹏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的革命,9月1日日记中记载,“(留日学生)多系革命党,装束皆为洋式,私运军火回华,专与国家为仇,各省学堂之学生入其党者亦众。该党魁孙文,广东人,出游日本,遂倡革命,现在声势浩大,行踪诡秘……”5天后,刘氏得知《晋报》关停,他遗憾地写道“顷闻《晋报》不出,由报馆主人被公立中学堂之人用强硬手段勒迫而罢也。《晋报》系光绪二十七年秋七月晋抚岑公春煊使之设立,迄今七月,凡六年,竟被学堂中人所坏,则学堂者之权力,可谓之大矣。”^②

由乔志强先生整理出版的《退想斋日记》,仅为刘大鹏日记中很小的部分,

^①《大公报》1903年5月15日,转引自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②刘大鹏著,乔志强整理《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但其中关于刘氏阅读《晋报》的记载已极为可观。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刘氏日记中对清末新政批评甚多,但对《晋报》却少有指责。可知他对《晋报》的主持者程涓并无了解,但对其为山西人所逐感到惋惜。

二、程涓的日本考察活动及反思

如前所述,甲午战后中国出现不少因公或因私赴日考察的人士,而庚子之后,清廷倡导新政,赴日考察者更是愈来愈多。在此背景下,为创办山西劝工陈列所和医学堂,程涓奉山西巡抚恩寿之命,赴日考察工艺、医学^①。从1906年8月17日(公历10月4日)自上海出发,到10月24日(公历12月9日)回到上海,程涓在日本进行了为期整两个月的考察,相关记录在1907年出版,即《丙午日本游记附山西兴革事宜条陈》^②。

程涓的赴日考察与其他人的考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一、程涓具有日本考察的经验,1904年曾自费考察大阪博览会并调查日本全国学务^③。二、程涓具有考察日本的便利条件。程涓在《晋报》馆中创办晋明小学堂^④,该校日语专修科毕业生有在日本留学者^⑤,而且该校中也聘有日本教习。这些人同太原当时其他新式学堂中的日本教习^⑥,以及中国的旅日商人、留学生等等,为程涓的日本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三、程涓是以私人身份到日本游历,他既不接触中国驻日本

①《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靳云鹏呈特保前交通部参事程涓拟请以道尹交政事堂存记任用并批令》,《政府公报》1914年第787期。

②本文所引《丙午日本游记附山西兴革事宜条陈》(以下简称《丙午日本游记》),无出版机构信息,应是作者程涓自印本,封面有“丁未(1907年)九秋,著者阳湖程伯嘉过京赠,亢虎”字样,可知该游记是程氏送给江亢虎,后为江氏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

③见《丙午日本游记·例言》。

④刘大鹏“晋垣学堂”,《潜园琐记》,转引自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⑤《丙午日本游记》,1906年9月11日(公历10月28日),第28页上。

⑥如日人三户章造,曾在山西农林学堂任教习,《丙午日本游记》,1906年8月21日(公历10月8日),第6页上。多田政固,为程涓所创立的晋明小学堂教习,见《丙午日本游记》8月24日(公历10月11日),第9页上。多田政固为程涓译出《日本文部省省视学官制》《日本褒赏法制》《日本小学校法制》等日本教育相关文献,见《丙午日本游记·附录》。

的公使及领事等外交官,也不拜见日本的高官,主要借助自己新认识的朋友(华商、日本人)。程涪将调查日程安排得很紧凑,便于对日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四、虽然在日本调查仅两个月,但程涪所留下的《丙午日本游记》,篇幅大于同一时期在日考察时间相近的大部分东游者的记录^①。

旅日期间,程涪到过许多学校、医院、工场、博物馆、展览馆,留下极为详细的记录,而其中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及反思,颇值得注意(为方便起见,文中所引日记用的是农历时间)。

作为中国人的国耻意识。初到日本,程涪即感到日本对中国的轻视。到东京不久,他就改装易服,因为“自长崎至此,途中日童之呼腔腔薄支者,随处而有,不得不暂易服装,以免歧视”^②。在博物馆、公园,程涪见到许多专门用以陈列的日本缴获的中国“战利品”。这些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异于莫大的耻辱,许多人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程涪却未回避,都一一记录下来,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不敢更惜小耻,致忘大耻,又不敢更惜个人之耻,而必欲公此耻于人人也……夫败固当耻,如日之胜我,而犹以受人干涉为耻者。窃顾吾国人,于此更进一解也”^③。1906年8月19日,程涪于长崎登陆后,即往观日本人陈列的甲午“战利品”,如镇远舰上的探海灯、炮和炮弹等。对此,程涪这样评价日人的行为“观其事事经营,无一不寓精神于尚武。”^④为将国耻展示给国人,在离开日本之前的10月7日,程涪专门请摄影师南工藤到靖国神社,避开日本当局的干扰,拍下日本陈列的那些来自中国的“战利品”,如九段坂国光馆前刻有李鸿章督造的大炮,英人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督造的大炮,还有从直隶深州以及辽宁运到日本的两尊石狮子等,印成照片数十张,附于《丙午日本游记》正文之前^⑤。

程涪敏感地意识到日本藉战争中缴获的中国战利品进行展览的意图,“一

①可资比较者有严修的《东游日记》、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以及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所收相关日记。

②《丙午日本游记》8月25日,第10页上。

③《丙午日本游记·又记》。

④《丙午日本游记》8月19日,第3页上。

⑤《丙午日本游记》,10月7日,第81页上—82页下。

以恢张武功，一以激劝后起”^①。他还清楚日本将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企图，“欧美远隔，力难与争，（日本）视线所注，遂并全力于西邻之我国。故近今渡来我国之商人，月必数百，学生之旅行于满洲者，动辄数千。彼以千锤百炼之学力，合而谋我。我以羸废应之，不亡何待？优胜劣败，天演公理。此岂能为日本咎哉？”^②在调查日本经济过程中，程澹也注意到日本的向外扩张，尤其是对中国进行的移民侵略。8月19日，程澹的记录是，“盖日人战后经营，悉取移民与保商政策。其移民政策，则全国人口统计约五千五百万，而岁出之米谷，仅敷五千余万人之食，势不得不为罄于邻国。自满洲经营后，而反哺于本国者，可年得三十余万人之养，而国内盗贼亦少。是以政府命之，各新闻纸复鼓吹而劝导之，全国人民遂皆有跃跃于移殖之趋势”^③。10月11日，程澹到东京（バツク）画报社考察，与主笔中村弥二郎以及安孙子贞治的笔谈也提到日人在中国东北的活动，“知其曾游历满洲。计近年日人之旅行于满洲者，每月恒有三百余人，内以商贾为多，商贾中尤以纺丝布帛为最，而今夏学生之往游满洲者略一千人”^④。

对于日本带给中国的耻辱，程澹主张反躬自省。例如，在去大阪的火车上，程澹看到一日本人绘制的画册，里面有侮辱中国的内容。对此，程澹以为中国人被日本人藐视是不谋自强的结果，“并坐者一日本人，手画报一册，因假观之，则绘有吾国人因立宪改革由日人代剪发辮者……复绘各国人代表图：日人持剑居首；吾国之辮发者，拖指挥刀随行回顾，状殊怯懦……噫！其轻藐吾国，何独在笔墨哉！而实吾国人之自取也”^⑤。

程澹对于中国民众的不开化，遇到侮辱而不觉，感到愤怒。在靖国神社的考察中，程澹看到一华人艺人裹着羊皮与马、牛等动物一同表演，立刻大怒“愤国力之衰弱，下至演技者，乃竟敢以之侷于牛马，同时演剧。彼恬不知耻，犹甘为之，何愠若此！”他甚至直接找到那个华人，给予车钱，令其在晚上到自己住的旅

①《丙午日本游记·又记》。

②《丙午日本游记·例言》。

③《丙午日本游记》8月19日，第3页下。

④《丙午日本游记》，10月11日，第89页上。

⑤《丙午日本游记》8月23日，第8页下—9页上。

馆相见。见面后,程洵劝诫那位华人艺人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侮辱到中国国体^①。

对中国当时教育尤其是留学教育的反思。教育考察是程洵日本考察活动的核心。与大部分东游者一样,程洵也注意考察各类学校的组织结构、职能、科系、课程、学制、教学条件、学生数量,甚至给学生成绩的方式等等;而与大部分东游者不同的是,程洵无时无刻不在对比中日的教育,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8月27日,参观东京振武学堂(清政府委托日本设立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程洵注意到中国各地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情况以及成效,其中清政府急功近利的做法,令他有些失望,“吾国学生,向未有入大学者。非不能入,盖稍有可入之资格,如毕业于户山于联队者十余人,已均为北洋及湖北调回;毕业于士官,虽亦有二百数十人,亦俱回国,而尤以北洋者为多。日本士官,其经历几许程度,始告成功,以赴战事。吾国今虽渐知重武,渐知练习,然费巨额之学资,所学未成,辄令回国。较以程度,终居人后,殊可惜也”^②。9月27日,参观东京农事试验场后,程洵又对比了中日于农业技术的不同做法,“彼国以绩学之士,用科学深邃之理,以攻究之,吾国乃委之乡愚。彼国几经试验,不厌精详以求改良;吾国乃一仍旧法。彼地多瘠薄,而今则阡陌成行;吾国以重农之国,而今多芜秽不治。于是出产终不能逾常格,水旱遍灾,惟仰给于移民赈粟,亦幸哉!地大物博之或可慰情也”^③。

在日期间,程洵屡屡向日人请教派遣留学生的办法,及如何推行新式教育等问题。9月6日,与日本女教师井口吾缙君笔谈,程洵得知日本文部省官费留学后必须为国服务的规定,进而想到中国当时的留学政策,“因思吾国历年派送学生,前后数已盈万,学生多无程度,卒业归国,亦不知所以用之。若日政府仅选派井口一人学习体操专门,归即遍施之于各校,费既省而效亦多,殊可法也”^④。而在目睹中国官员因不了解情况,在日本浪费大量财力购买教学标本物品时,程洵

①《丙午日本游记》9月19日,第41页上—41页下。

②《丙午日本游记》8月27日,第12页上、下。

③《丙午日本游记》9月27日,第60页下—61页上。

④《丙午日本游记》9月8日,第25页下。

指出,中国推行新式教育,应该“有日本以为车鉴……又学校贵精神,不贵形式;贵教育之普及,不贵程度之过高。今当需才孔亟时,倘一不慎,既不足造就人才,而因地大势涣,其失败之财力,当更千百倍于日本。至日本学校自小学至高等,教习支俸,皆有一定数目,而不能参差。我国延聘日员,当调查其卒业何校,得第几级学俸,今自吾国酌加几何足矣”^①。

为更为清楚地了解新式教育中的种种问题,程涓还多次向日本教育部门官员进行请教。9月12日,程涓见到东京府学务课长涩谷元良,了解日本从文部省到府县学校整个学务系统的情况^②。9月18日,程涓与涩谷再次进行深入交流。他先是询问在中国推行新式教育的办法。涩谷建议“智识与道德须并进。于他邦之事,取长补短,以斟酌适要为宜。愿贵邦朝廷速定教育之大方针,依之实施”。继而问到财力不济的情况下,政府怎样推行强迫教育的问题。涩谷认为,政府首先要进行宣传,发动媒体,让民众了解到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其次,确定奖励教师、奖励地方推进教育成效显著的办法;并督促家长,从而推动基础教育的普及。程涓还问到教科书问题。涩谷的建议是,日本教科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将来必须得自行编纂。此外,程涓还问到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顽固派的掣肘问题。涩谷建议,“官民虽少醒觉,唯其醒觉可待。如仁兄热诚兴学之辈,日夕倡导之声,愿由新闻由演说以启众盲,由学校经营示其实进,冀具眼之官绅,整理学制”^③。最后,双方还谈到中国留日学生质量提升的问题。涩谷建议中国对留日毕业生要进行测试,以便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在聘请日本人作教习时,最好请日本文部省进行推荐^④。10月1日,程涓第三次拜见涩谷元良,两人谈到日本聘用外籍教员及工厂人员的薪水问题^⑤。

10月23日,在回上海途中整理在日本收集到的教育相关文件时,程涓仍在思考日本推行新式教育的做法,尤其是聘请外籍教师的特点,“大学各科,非有极深研几之素学,不能膺讲师之选。是以所聘均系欧美名家,远涉重洋,自非月

①《丙午日本游记》8月29日,第14页上。

②《丙午日本游记》9月12日,第29页上—31页上。

③《丙午日本游记》9月18日,第37页下—39页上。

④《丙午日本游记》9月18日,39页上、下。

⑤《丙午日本游记》,10月1日,第66页下。

俸较昂不可。其他则自数十元以至三四百元不等”。进而对中国推行新式教育成效不显的原因进行反思,即给外籍教习提供薪水过高,却以教育自主为名,限制其才能的发挥,“吾国各省办理学务,延聘教员,薪资皆以二三百两为普通数……今各省因延聘教员,往往派专员赴东,由钦使转达日本外部与文部省……自奉既奢,所聘教员必不能薄待,则川资各费又安得不厚……夫各省官场,既惟知优厚聘金,延任教育,其果能获益于外人犹可说也。而一般督办提调,不学无术,积习甚深,茫然不知教育为何事。而与外人所定合同,于督办权限一条,必最注重,意必如此始可钳制外人也。于是教员偶有所见,欲图改良,恒为权限所域,不便越俎。官场既尚敷衍,外人亦何乐不为其逸哉?此其糜款费时、久而无效之原因也”^①。

在与留学生以及日本教育者接触的过程中,程涓逐渐意识到中国留日学生大部分基础较差,而清政府方面在留学问题上目的并不明确,从而白白浪费了大量财力。8月26日,程涓遇到山西留日学生郭伊(字莘耕,曾任山西商会会长),得知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日语不好者居多,而日本争开私立学校,以投所好。程涓当即想到中国大可设立语言学校,“以为游学之预备,免贸贸赴东,浪掷金钱也”^②。日本官员关于大部分留学生根底很差、学业未成匆匆返国的提醒,也刺激到程涓,“‘贵邦每派留学生,动辄数百,动费数千数万,信乎地大物博,为力甚易。然年年如此,省省如此,意必于学务前途,有蒸蒸日上之趋势。而每见内地学校,依然科举之形式,在东学生每无根底,恒有学业未成、匆匆返国者。实不知贵邦办学诸公命意之所在也’,予闻是言,惟有汗颜相对而已”^③。由是,程涓再次提出中国通商口岸大可办留学预备学校,对预备留学的人员进行语言及基础知识的培训,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留学经费,还可以提高留学生的质量^④。

日本教育产品销往中国的情况及启示。8月24日,程涓见到上海科学仪器馆在日采买仪器的张之铭^⑤。8月27日,日人福田清一告诉程涓,中国学堂用具

①《丙午日本游记》,10月23日,第102页上—102页下。

②《丙午日本游记》,8月26日,第11页上。

③《丙午日本游记》,10月23日,第103页上—103页下。

④《丙午日本游记》,10月23日,第103页上。

⑤《丙午日本游记》,8月24日,第9页上。

大部来自日本东京的三越工场,“今则浙江高等学堂共购五千元。又云南提学使定购伍佰元。各提学使抵任后,亦必陆续购办。而湖北黄提学之公子某,每星期必至该所学习二回云”^①。两日后,程涓遇到陕西留学监督缪石逸在东京采买图书标本,共费三百二十元。程涓叹道“余视其所购者,亦仅值数十元耳。购自日本即需重价,则合各省计之,此费殆不贖矣。缪君又言(陕西)师范学堂开办,已费至十三万元,在日本所购书籍仪器模型标本等约万元。”^②程涓指出中国学堂购置的教学标本,大部分在国内可以找到,没有必要全部到日本购买。

9月12日,程涓参观一印刷所,了解到该所绘制的“博物图谱及教科书图画,均运销于吾国者”^③。10月6日,得知大江刷印局印刷的地图大量销往中国,与主人笔谈,了解到“每年销售于吾国之地图三万册,教科书约一万册,合银五万元。而其同业最大之店,计三省堂、三松堂、金港堂、东亚公司,合共五家。该店在上海有分销处,在棋盘街之勤学社。他若广智、文明、科学仪器馆、中西教育器械馆等,均代分售。日人近年以图书销售吾国者,盖亦一大宗也”^④。

日本实业可资中国借鉴者。8月25日,从同乡谢康伯祖元处,程涓了解到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情况,分为预科、本科和专修科,在了解专修科以“立身报国、勤信谦让为根本”后,程涓想到的却是,“吾国国民有商才而无商德,所亟宜设学改良者”^⑤。

9月1日,程涓与王惕斋一同参观东京漆工纵览所,在了解到日本漆器产业的发展情况后,程涓注意到日本漆器不用中国漆,原因是“中国漆非不佳,以漆商恒喜掺油,遂不能制造精美物品”^⑥。同日,程涓还与王惕斋一同到制造军装服饰的中野商店。该店“每年除己国自用外,销售于吾国者最多。计去年北洋来此采购金银线制之帽章肩章服章等,共三十万元”^⑦。这个数字令程涓很是震

①《丙午日本游记》8月27日,第11页上。

②《丙午日本游记》8月29日,第13页下一第14页下。

③《丙午日本游记》9月12日,第29页上。

④《丙午日本游记》,10月6日,第81页上。

⑤《丙午日本游记》8月25日,第9页下一第10页上。

⑥《丙午日本游记》9月1日,第15页下。

⑦《丙午日本游记》9月1日,第16页上。

惊,由是想到,“中人但知墨守,且视此等工艺为无足重轻。不知即此戈戈,已年耗我数十万金矣”^①。

9月7日,在日本一家小店,程澐注意到里面的绸缎“视吾国之缎无色矣”,因之发出中国应该效法日本改进绸缎工艺的呼声,“吾国苏杭各产,倘能加意织花闪色,复能仿其治丝之法,则成本轻而外销广矣”^②。9月27日,在蚕业讲习所,程澐看到世界历年输出蚕丝织物表,得知日本横滨一地出口数,与中国江浙两省输送到上海出口的数量相仿佛,他提醒国人“吾国商品仅恃丝茶,对此能无愧色?”^③

离开日本之前,程澐获得日本全国工厂的统计资料:“大阪府 1185 家,兵库县 680 家,东京府 640 家,长野县 560 家……合共 9241 家,各厂雇工男 207997 人,女 318406 人。”又得共进会章程一卷,认为其中不少值得效仿,“吾国工艺方极幼稚,劝商劝工等场必将陆续举办,章程中固有可资效仿者”^④。于是,程澐摘要记录了章程中关于博览会的一些制度,以供参考。

亲历中日交涉,推动日本政府退还华商家屋税。10月22日(公历12月7日),程澐在长崎见到华商会馆副董苏道生,得知日本政府对华商的歧视:1899年,日本政府开始加征外国人在日本的房屋税。在日本的西方人不接受日本政府的做法,向海牙平和会(即万国和平会议)提起诉讼。海牙最终裁定日本政府加征外国人房屋税不合法。1906年,明治天皇下诏退还外国人房屋税,但华商并不在退还之列。虽然自1906年起,日本政府不再征华商的房屋税,但之前七年间从各地华人手中征去的税已有三十余万元。华商们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政府态度很傲慢。1906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到期,改约期限为半年。华商向清廷驻日公使杨枢提出交涉请求,公使态度却很消极,甚至故意刁难,要华商汇集到征税收条,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⑤。

程澐了解了这些情况,“愤堂堂公使不能据理力争,且并应得之权利一切放

①《丙午日本游记》,9月1日,第16页下。

②《丙午日本游记》,9月7日,第22页上。

③《丙午日本游记》,9月27日,第57页上。

④《丙午日本游记》,10月10日,第86页下。

⑤《丙午日本游记》,10月22日,第97页下—98页上。

弃,视华商身命若赘疣,无怪外人之遇事薄视也”,乃决定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使杨枢施压,以推动中日交涉的进程^①。程澹将华商给清廷外务部的禀文在上海《中外日报》上刊载,表达华商对于中日改约的期望,“此次约满,重在改约。约可包税,税不能包约。我国吃亏不止税则一项。现在当争者:一、最惠国;二、利益均沾;三、领事优待特权;四、协定税;五、华商在日本所纳一切税额,不得过于其内国人及最惠国……各国虎视鹰瞵,愈让愈受其要挟,且各国无半面条约之理。如日本人与我订其入口税,而我未与彼订我之入口税;我允待以最惠国,而彼不允待我以最惠国,是即所谓半面条约……如此外侮叠乘,伊于胡底?”在程澹的影响下,《中外日报》刊出题为《论留日华商请杨公使力争家屋税事》的专论,矛头直指驻日公使杨枢的失职。“惟近时因家屋税一案,寓日商人对于杨京卿颇有不满之意。华商之苛求京卿耶?抑京卿之负此公使也?然其不能保护商民,争执权利,则固万无可辞。夫国家简派公使,其责任固甚重。商民之对于公使,其期望亦至深。今若徒有拥皇华、称钦差之荣耀,而于应争之事则不欲争,可争之事则不敢争,坐使本国之商民受主国之待遇与他国异,而且同处一隅之地,乃较诸各国之商民,其所享之权利,显有天壤之殊,则不公使之咎而谁咎哉?固无怪商民之有觖望也……记者曰:呜呼!今之奉国书、衔皇命、涉重洋而任公使者,其数已以七八计,其能无歉于公使之职任者鲜矣……今若坐视商民之欺给,而不能尽力;坐视利权之损失,而不能与争,则有公使与无公使等,又何用此公使为?”^②

程澹的影响体现在,《中外日报》报道之前,国内新闻媒体对日本华商争取退税权益这件事多持漠视的态度。如10月间《通问报》的报道,仅是给出日本外务省拒绝退还华商家屋税的理由“外部答称,此税须照日本律例,仍向华人征收,因免税之例只准欧美各国,故海牙和平会之所判断,中国不在其内。”^③同期出版的《外交报》、12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皆刊载了海牙对日本征收外国人家屋税的判决书全文,却无一语涉及华商的正当权益^④。甚至11月30日《外交

①《丙午日本游记》,10月22日,第98页上。

②《丙午日本游记》,10月22日,第99页下—100页上。

③《日外部不准华侨免纳家屋税》,《通问报(耶稣家庭新闻)》1906年第227期。

④《家屋税判决书》,《外交报》1906年第6卷第26期《家屋税判决书》,《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13期。

报》还刊载了日本《明治学报》的一篇题为《论家屋税》的译文,表达的是日本对海牙裁判的不满“按:永久借地权之在外国犹有应征家屋税者,而我国则不独租界,即内地家屋,一经外人居住或具名,权悉为其所有,是皆治外法权阶之祸也。”^①

而在《中外日报》专论刊出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申报》也站出来指斥驻日公使杨枢的不作为“华商侨居日本长崎者,自明治三十二年,起均纳家屋税,至今七年。欧美国人民因昔日亦纳此税,致与日政府涉讼,在荷兰海牙裁判所得之前纳之税统由日本归还,已于上月二日由日本一律清还。惟华人之家屋税未还,且欲征收,而杨使复不力争。本月二十四日,长崎众商在商会集议,并电致农商部,请向日政府理论云。”^②迫于压力,驻日公使杨枢就华商家屋税事与日本外务省重新进行交涉,并很快指令横滨领事“札行事照得华商稟请照商日外部将已纳家屋税一律交还一案,业经本大臣照会日外部,妥照办理。”^③

1907年,日本政府终于妥协,首先是日本横滨市役长发还华商所纳房屋税^④;继而宣布发还之前所收华商的家屋税、自来水税^⑤。为感谢程澐在此次交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长崎华商副会董苏道生专门写信表示感谢,“客月台驾过崎,聆教益为幸。家屋税事,前蒙即登《中外日报》,震惊钦使,嗣得去向日本外务部竭力说项。今已准与欧美一律归还华商,还期在新历下月中。度必可如华商所争之愿矣。惟是饮水思源,此事皆出阁下之鼎力。衔感者不特第一人,即羁留日本之全数华商,靡不感德于靡既也。兹以崎埠所载家屋税归还之日本报纸邮呈,至请察鉴,以昭实迹。倘欲借侦探东方之事,希即示晓。弟当效力也。”^⑥

①《论永久借地之家屋税》,《外交报》1906年第6卷第30期。

②《长崎华商争还家屋税》,《申报》1906年12月13日,第3版。

③《出使日本国大臣杨为家屋税事札横滨领事文》,《外交报》1906年第6卷第35期。

④《十大事月表·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杂志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692页。

⑤《发还华人家屋税、自来水税》,《申报》1907年2月19日,第3版。

⑥《苏道生致程澐函》,《丙午日本游记》,第100页上。

三、回国后程涓给当局的建议

回国后,程涓就自己在日本的考察经历及平日所思所想,向山西巡抚恩寿提出建议,即《上恩中丞条陈山西兴革事宜禀》一文。程涓建议政府破格录用人才;对官员进行培训,涉及内政、外交、国势、民情、学务、路矿、实业、戒烟、天足等等,并进行考核。为实行新政,程涓还建议延长官员任期。此外,程涓还提出下列主张:整顿警察以强化地方治安;推动地方以白话颁行告示;施行强迫阅报稽查演说;改良戏剧,藉以为风化之助;在官员子弟中首先推行强迫教育,利用各省会馆作学堂,通过候补官吏摊派筹集经费;学堂用人破除省界;师范教育注重精神,即爱国教育;提倡女性教育,注重职业教育;农林学堂加增畜牧方面的培训;消除地方狼豹对百姓的侵害;延揽正太铁路修筑过程中的学徒,用于扩充机器局;要求巡抚及各级官吏带头集股兴办实业;以各城市的城楼为场所,吸收游民进行日用产品的生产;破除省界之见,大开晋矿以富中国。

在给山西巡抚的建议中,与程涓日本考察直接相关者,包括提倡演说及改良新剧。其中演说观念的产生,不仅有程涓个人的见解,还有来自日人的建议。早在抵达日本之初,在会见长崎华商时,程涓就建议当地华商提倡讲报演说,借以改变下层华商的陋习^①。与日本东京府学务课长涩谷长元的交流中,在谈及改革过程中解决顽固派掣肘问题的办法时,涩谷的建议也涉及了演说,“官民岁少醒觉,唯其醒觉可待。如仁兄热诚兴学之辈,日夕倡导之声,愿由新闻、由演说以启众盲,由学校经营示其实进。冀具眼之官绅,整理学制”^②。这进一步强化了程涓对新闻与演说在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视。至于新剧改良的提倡,则来自程涓在日本的观剧体验。旅日期间,程涓曾与同乡谢康伯去日本剧场看剧,了解到新的戏剧在日本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新剧出,恒演至数日、十余日、月余不等。盖皆于社会有裨益者……戏剧之于社会,关系实非浅鲜。近闻津沪各茶园有改

^①《丙午日本游记》8月20日,第4页下。

^②《丙午日本游记》9月18日,第38页下—39页上。

良戏曲之举,得在上者奖劝之,学士文人复各出其续余,化导下流,普开民智,一扫淫靡之习、迷信之风,亦教育之助也”^①。

此外,程涓关于强迫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农林学堂设置等建议,也与其日本的考察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

除了《上恩中丞条陈山西兴革事宜禀》文外,程涓还撰写了《上恩中丞拟设曲西运煤公司禀》,专门解决太原西山产煤运输困难的问题。程涓提出集股五万元,兴修从太原西门到西山长达三十余里的简便铁路,既将煤运到省城,同时把煤燃烧后产生的煤渣运回西山填充矿坑。最终因山西绅商以主事者程涓等为外省人,而未能实行^②。为推动山西实业的发展,程涓还拟定《山西劝工陈列所改良章程》《拟办山西商团进步会章程》,希望借助定期开会、演讲、体操、音乐、报纸甚至游学等方式,促进山西商业团体的进步。

除了给山西巡抚上书,推动山西实业、商业进步之外,程涓还将建议提交给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及都察院。

1906年底,程涓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主要谈的是拓展电报业的问题。通过比较中、英、美、日官办电报机构的总收入,程涓指出中国电报业的发展潜力巨大,进而提出推进中国电报业发展的三个方面:一是推广子局。中国直省州县一千七百多,然总局分局只设三百所,而山西、陕西、贵州等省各仅有三局。以山西为例,大同、归化等地区皆无电报局,以至于1905年出现匪患,与省城太原联络还是靠提塘驿传联络。各省类似情况不少,广设电报子局有很大空间。另一是整顿学堂。程涓认为,发展电报业不能依赖外国人,应该在各省设立电报学堂,培养本国人才。人才多,从业人员薪水就可以降下来;人才多,形成产业,通过仿制国外电报业发展所需的相关器材,也能降低成本。三是节约靡费。程涓提出利用中国人孙光泰、丁生槐研制发报所需的电机,集聚人才,担任制造、维修电报器材的工作,以降低电报业建设的费用。此外,程涓还建议裁撤冗员,“多设分

^①《丙午日本游记》9月14日,第31页上、下。

^②《山西通函》,《申报》1907年7月4日第20版。

局,不设总分局,于总局文案等员痛加淘汰”^①。

1907年,程涓还到北京,呈给都察院一份建议书,11月刊于《政治官报》与《顺天时报》中。程涓指出“振兴中国,首须打开民智,养成国家观念;而兴实业、讲制造、裕财政,皆为急切难缓之图。”^②其建议共包括十七条:一、实行尊孔,注重乐歌瞻礼。二、学习日本,报刊媒体要为推动宪政及国家进步发挥作用。三、破格录用人才。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语言(北京官音)的举措,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语言代表思想,语言不一,则情意相隔而无感触,志趣涣散而难团结”。五、注重精神教育,使人人有国家观念。程涓通过日本甲午战后通过战利品展出、教科书等形式“激励”日本国民的例子,进而说明“爱国即所以保国,爱国之精神欲深入于人心,必教育不为功也。宜由学部悬重赏赏募编教科书籍,激发国耻,提倡各种精神教育,俾人人有国家观念,收效必极远大”。六、在官员子弟中率先实行强迫教育。其逻辑是,“欲开民智,先开官智”,“今以旧习惯之官吏强其执行新政,学非素具,非阻碍即敷衍,即有欲竭力办事者亦苦无正当办法,故新政虽颁,上行而下不能效”。七、在各省开办白话演说各报,以补学堂的不足。八、注重女子职业教育,与男学并重。九、造就专门人才,以资应用。十、专派学生出洋学习炼钢,以立制造基础。十一、吸引外洋华商开办晋矿,以救全国之贫。十二、在煤铁产地(山西平定州)设立北厂,制造军械,供应东北、内蒙、京畿以及山陕等地武备的需要。十三、大招商人承办各项工厂,从而减少官款的靡费。十四、派技术工人出国深造,以求实效。十四、各省在上海合开全国博览会,以促全国工商之进步。十五、统筹全局,整顿全国租税以清偿赔款。十六、优恤为公益死事之教员学生,以维系人心。十七、建议学部组织中西学问俱佳的人员将《圣经》翻译成至美华文,颁行各省,以一视听而息教案,“其与孔教暗合者,即以四子六经成语彼此互证,贯串成文,篇幅不宜冗长,俾得卒读。精译精印,颁行各省学堂官署,俾阅者咸知西教不外墨子‘兼爱’劝人为善之旨,则一切猜嫌均

^①《程观察涓上直督整顿电政禀》,《南洋商务报》1906年第10期;另载于《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3期。

^②都察院《代递道员程涓应诏陈言呈请代奏呈》,《政治官报》1907年第25期;另刊于《顺天时报》1907年11月22日。

可涣然冰释”^①。

虽然给当局提出如此多的建议,但程涓对清政府当局是否采纳其建议,并未抱有太大的希望。在回到山西与日人高桥昌的笔谈中,程涓体现了对清廷新政的失望,“敝邦官吏无久于其位者。更易频频,权不统一。故开办之事多,收效之事少。且以素无经历之人办事,故各省新政均无效果”^②。

余 论

为期两个月的日本之行,程涓对日本的教育、医学、实业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在对比中日近代以来的发展状况之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给清政府提出许多建议。但清末时人对程涓东游经历以及个人见识的评价记载甚少,仅在长期于光绪、慈禧身边担任史官的同乡恽毓鼎那里有过零星记录。1908年,程涓与恽毓鼎相识,两人的相识并非因同乡之关系,而是源于浙江人洪瑞生的介绍,“浙江人洪继祥(瑞生)介程伯葭来见,山西候补直隶州”^③。十余日后,两人再次见面、交谈,恽毓鼎对程涓的个人见识已然很是赞赏,“伯葭留心时事,其识甚卓”^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1月29日,清帝宣布退位。5月11日(旧历3月25日),恽毓鼎在读《东方杂志》上的《振兴农工商业书》一文时,留下这样的记录:“程伯葭尝谓‘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真名言也。”^⑤

作为一位几乎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程涓有着极大的抱负,他曾一心想在新政中有所建树,在山西创办过报纸、学堂,东游后又向当局提出许多建议,却不为所用,甚至还因路矿问题为山西士绅所驱逐。进入民国后,程涓的经历仍很丰

①都察院《代递道员程涓应诏陈言呈请代奏呈》,《政治官报》1907年第25—30期;另刊于《顺天时报》1907年11月22、23、26、27、28、29日。

②《丙午日本游记》,10月24日回到上海,回晋时间不详,第104页下。

③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1908年7月27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④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1908年8月1日,第392页。

⑤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1912年5月11日,第590—591页。

富,一改之前的“新政”观念,力主尊孔读经。

程澐曾多次寄希望于北洋军阀,如吴佩孚、张宗昌等人的支持,达到尊孔读经的目的。1923年,程澐曾就恢复读经问题,给吴佩孚写信^①。1927年6月20日,张宗昌致潘复函,赞同程澐通过尊孔读经以抵制三民主义的主张。“顷程伯葭清条陈整理教育及言论机关两事,办法正当。查南方党军所至之处,皆改各校为中山学校,教员非经训练三月中山主义者,不准在校教授。于是,青年子弟全体化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者,人心大变,中国大乱将不可收拾……兹特介绍伯葭诣前,将其中之阻力及学校加入读经之办法,详细面陈,如荷采纳,俾黄河以北各省各校从速改变宗旨,读吾孔子之书,讲礼义廉耻之四维主义,则未始非抵制三民主义之良法,而移易人心,安危定变,所关尤巨。”^②除了借助政治的力量之外,程澐还通过出版《历代尊孔记》及《孔教外论》,宣扬自己的主张。他的书在当时发行甚广:“程白葭编著之《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由中国道德会出版,历时八月,翻版七次,共印一万余部。内容有历代尊孔记实及欧美各国学者对孔教之论列,如卫西琴(美)、李佳白(美)、李提摩太(英)、益沙令(俄)、多麻斯(法)、费希礼(德)、那顿(意)、有贺长雄(日),三十余篇,插图二十余,十万言。”^③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程澐仍然坚持自己的尊孔读经主张,《吴湖帆日记》中有记载了相关的情况,“(1938年2月22日)伯葭为提倡尊孔学之热心者,大骂以前政府之种种不尊儒教,自造逆孽,以致大乱”,“(4月9日)午后程伯葭、程云岑同来,大发尊孔议论”^④。1938年,《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第15版得到认购3.7万部。

从早期的新政追求,到更多在传统中寻找中国立足世界的资源,程澐的思想世界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又是否与其早年的东游考察经历有关,作者将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①《吴佩孚与程澐书》,《爱国报》1923年第11期。

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

③《申报》1934年1月26日第12版。

④《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208页。